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京内资准字0609-L0057号
北京交大印刷厂印刷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4年 第 22 期
总第(344)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4年11月30日

目 录

世界一流智库如何保证研究的独立性 ——基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	刘昌乾 (02)
智库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 ——以美国“教育政策中心”为例·····	谷贤林 (06)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析 ——兼论优质大学智库的培育·····	侯定凯 (10)
大学智库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础·····	王莉丽 (15)
英国高校教育智库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研究 ——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	郭 婧 (17)
美国一流高校智库人员配置与管理模式研究 ——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例·····	陈英霞 刘 昊 (22)
地方高校智库的属性及其发展策略·····	高振强 (27)
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积极打造新型智库·····	《中国教育报》(31)

编者的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智库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校人才资源集中,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实力雄厚,对外交流广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仍然滞后,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社会影响力。如何提升高校智库参与政策咨询、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发挥与社会公众互动、引导社会舆论的优势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方面。本刊以“高校智库建设”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国内外相关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 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范笑仙 责任编辑:聂文静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 编:100082 电 话:(010)59893297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世界一流智库如何保证研究的独立性

——基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

刘昌乾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新事物、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加强智库建设既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迫切需要，也是回应人民期待、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表明我国政府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智库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同志就加强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为新形势下推动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世界顶级智库的代表，影响力居于全球之首。“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既是布鲁金斯学会拥有全球信誉度的核心所在，也是布鲁金斯学会一以贯之的信条和灵魂。在学会坚守的“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三大核心价值中，又以“独立性”最为核心和关键，也因此最为学会所珍视，很大程度上来说，“独立性”是学会产生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建立政策影响力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研究致力于探讨这种“独立性”的保障条件，希望通过布鲁金斯学会维持研究独立性的条件因素研究，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

一、布鲁金斯学会概述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华盛顿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库之一，其规模之大、历史之久远、研究之深入，被称为美国乃至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并不为过。

1. 最值得信赖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一家坐落于美国华盛顿的非营利性公共政策研究组织，遵循“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宗旨，提

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常被称为“开明的思想库”，是美国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中最有可信度的研究机构之一。学会之所以能在华盛顿取得如此重要的影响和尊重，很大原因在于学会超越了党派之争。哈里斯全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16个对公共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中，布鲁金斯学会是最值得信赖的十大机构之一，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独立派都认为学会同样值得信赖。

2. 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向被誉为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布鲁金斯学会90周年领导力论坛上指出，布鲁金斯学会过去一直是美国每一个政策议题辩论的中心。根据2009-2012年的全球智库报告，布鲁金斯学会连续几年一直位居全球第一智库的宝座。2012年最新一期《2012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的各专业智库排名中，布鲁金斯学会分别位居国际化发展智库第一名、国内经济政策智库第一名、社会政策智库第一名、最佳创新政策建议智库第一名、突出政策研究项目智库第一名、最佳外部关系/公众参与智库第一名、2011-2012年最佳政策研究/报告第一名。

3. 最具规模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拥有超过300位权威专家，从事超过80个研究项目，提供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高质量研究、政策建议和分析报告。这些专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观点和文章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scholar practitioner）。除了拥有数量庞大的研究人员，学会在机构设置中还拥有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21世纪安全和情报中心、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全民教育研究中心、儿童和家庭研究中心、社会和经济动力中心、美欧关系研究中心、恩格尔贝格医疗改革中心、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萨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城市税收研究中心等14个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多哈中心、布鲁金斯-印度中心、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等3个海外中心。

4. 最有历史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1916年，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政府研究所”，其宗旨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联邦政府的管理”。1922年和1924年，布鲁金斯又分别创建经济研究所和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1927年，布鲁金斯将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经济学研究所和1924年成立的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合并，成立了布鲁金斯学会，从而使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

二、布鲁金斯学会的核心价值

布鲁金斯学会的使命是开展高质量、独立的研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实用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三个目标：加强和捍卫美国民主；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经济社会福利、安全以及机遇；确保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体系。可以说，“质量（Quality）、独立（Independence）和影响（Impact）”是布鲁金斯学会一直秉持的核心价值或者说坚持的信条，也是布鲁金斯学会成为全球顶尖智库的关键。正如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所说：“布鲁金斯能够成为一个顶级智库，关键在于它一直坚守三个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三个价值整合在一起，指导着我们的研究，并界定了我们学会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奠定了我们成为全球领先智库的声誉。”

1. 高质量。布鲁金斯学会要求其学者进行高质量的、独立的研究，并提出有创新性的实际政策建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的高质量 and 追求卓越的良好声誉源于学会所拥有的几百位驻所和非驻所研究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受人尊敬，有的人誉满全球。他们通过跨领域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跨全球的合作，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到的见解和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正如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任何一个智库的成功首先都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专家的实力。布鲁金斯三个核心价值的第一个价值——质量，是由我们的专家决定的。我们寻找的是那些在各自领域领先的优秀研究者和决策者，他们不仅思维缜密，而且富有创新性和创造力，懂得怎么把他们的思想和现实世界的问题结合起来”。学会设有外交政策、治理研究、都市政策研究、世界经济与发展、经济研究等5大研究领域，每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都是从公众的共同利益出发而设置，因此绝大部分的研究都不会与一个特定的资助方发生关联，即使研究和资助方存在关联，学会也会将研究结果公布在网站上，而不是私下投送给资助者。由于拥有顶尖的、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以及研究人员不受资金、指标等外部环境的干扰，使得研究人员能够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保证了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权威性和持续性。

2. 独立性。独立性是布鲁金斯学会最为珍视的资产，也是学会始终坚守的信条。首先，独立意味着研究不受资助方的影响，即无论研究资金从哪里来，研究都应该是独立而客观的，不受资金来源的左右。研究者不用顾虑资助者的态度，而只考虑研究的目标，努力做到客观和独立。其次，独立意味着思想和研究的独立，学会的学者以开放的思维来开始他们的研究项目，并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分析获得结论，做到基于事实来说明问题，而不被政治走向所影响。对于学会研究者个人而言，独立意味着他们应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非党派成员，虽然学会很多学者在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一个坚定的共识就是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平台不能用来为某一个党派的目标服务。在学会主席塔尔伯特看来，“独立性意味着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都认真对待学会的观点、思想，都看重学会的独立分析。不仅如此，独立性还让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聚集起来进行理性和坦率的辩论成为可能。”

3. 影响力。影响力是学会区别于高校或者其他研究机构的关键。布鲁金斯学会鼓励研究人员去研究那些对决策者和决策能够产生影响的问题，要让研究成果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不仅关心新知识的生产，更关心知识

的应用，最为关键的是关心研究成果对决策的影响。学会影响力至少有三种形式：设定议程，引领讨论，以及设计政策，即通过与各种政治机构、企业界、非营利组织、主流媒体、研究者和学术界的沟通，介绍一种新的观点或者让某一个问题的引起足够重视，实现议程设置；在某个议程设定后，创造合适的氛围和平台，把相关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针对当前重要的议题进行公开的或者非公开的讨论；待充分的讨论后，学会把负责某个特定领域的高层决策者或者立法者作为目标，有针对性地提供研究和政策建议。当然，布鲁金斯学会发挥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途径还体现在学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人才旋转门机制”。如在奥巴马政府中，由学会研究人员担任的高层决策者就包括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Larry Summers）、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Susan Rice）、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伦（Tom Donilon）、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奥斯泽格（Peter Orszag）、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资深主任贝德（Jeffery Bader）等。

三、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的独立性保证

智库研究的独立性是其获得影响力最为重要的因素。在“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三个核心价值中，独立性是布鲁金斯学会最珍视的价值或者信条。也正是因为学会一直秉持和坚守“独立性”这一核心价值，才使得学会能够产生一系列高质量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奠定学会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学术声誉和政策影响。在美国两党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保证研究的独立性，保证不带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的研究，需要一系列规则和机制来加以规定和保证。就布鲁金斯学会而言，其研究的独立性主要是通过丰富的筹资渠道、附条件的资助机制、非党派性的要求、多通道的影响力建设等措施加以保证：

（一）多元丰富的筹资渠道是保证研究独立的前提

资金是一个组织得以运行的重要保障和前提。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渠道，布鲁金斯学会最大限度保持了财政上的独立，从而在运作上不过分依赖于几个较大的出资者而被他们的利益所影响；同时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多元丰富的筹资渠道

使得学会也不用为了谋取商业回报而迎合资助者的要求。作为非营利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资金来自于创始人布鲁金斯的基金、社会捐款及出版物收入，由学会财务部门进行专门管理，并在其官网上发布年度财务报告，接受公众监督。2013年布鲁金斯学会的赞助和收益达到9785万美元，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的补助拨款，合同拨款，基金会、公司、大学及研究机构以及个人的捐款等。稳定多元的资金筹集渠道不仅保证了学会的日常运转，而且充分保证了学会研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为学会成为最值得信赖和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物质保障。

表1：布鲁金斯学会资金来源情况（2012-2013年）

赞助和收益	金额（千美元）	
	2013年	2012年
拨款和合同、捐赠	80,276	114,837
业务投资回报	12,996	12,787
基金及其他收入	2,862	2,472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1,716	1,941
总计	97,850	132,037

（二）附条件的资助机制是保证研究独立的关键

在拓宽资金来源的同时，布鲁金斯学会对资助者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规定，其中最核心的规定就是资助者不能对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项目和研究结论进行干预。作为一个运营成熟的非营利组织，学会要求资助方遵循学会关于资金资助的规则，并履行一定的义务，其中最基本的义务是不得干预学会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在对学会的资助中，绝大多数的研究资金与研究项目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关系，这从制度上切断了资金提供方与学会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保证了研究者可在不受资金提供方影响的情况下依据客观事实做出独立判断。即使有个别项目的资金提供方有特别的要求，但学会或研究者依然享有保留发表这些成果的权利，学会确保将成果公布在网站上，或将报告公开发布，而不是私下投送给资助者。正如约翰·桑顿所强调的，布鲁金斯的经费来源是多元化的，包括大量公共和私人的资助。资助来源的多元化对于保持独立性和保证研究质量非常关键，资助者在学术和资金方面都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最终必须由学会的学者来决定研究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

(三) “非党派性”的要求是保证研究独立的基本原则

布鲁金斯学会在立场上坚持非党派性和公民性,不为某一党派的目标服务,不作为任一政党的传声筒,只为社会公益发展。因此,对学会的研究人员而言,这就意味他们必须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非党派机构的成员。为了保证学会研究人员执行非党派的政策,布鲁金斯学会专门就研究人员参与政治活动作出规定:必须使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即使研究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政治活动,也必须表明他们的行动仅仅是个人行为,而不代表布鲁金斯学会;不能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设备或其他资源,包括计算机、电话和复印机等,或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场地举行政治活动;在公共场合或媒体采访中不能为候选人代言等等。这一系列的规定和要求为学会超越党派之争、开展独立研究提供了基本准则。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影响研究人员的立场和判断,进而影响到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不允许其研究人员在学会工作的同时具有政府部门重要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说学会的学者必须在政府公职和学会成员之间进行抉择。如学会资深学者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与奥巴马的联系十分紧密,曾是奥巴马竞选阵营中的成员,这是一种不同于学会学者的角色。当扮演这类角色的时候,学者就需要暂时离开布鲁金斯学会。即使是短期被委以公干,也需要根据时间的长短决定去留,如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的副主持人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在主持巴以会谈时就需要暂时离开学会,如果会谈要持续下去,他就需要决定是留在布鲁金斯还是辞职。

(四) 多通道的影响力建设是保证研究独立的重要基础

智库的地位和声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它对政策的影响。布鲁金斯学会作为世界一流智库,通过广泛的渠道和多种方式发挥着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和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力。学会影响政策的方式主要包括:通过定期出版物向政策决策者、公众和新闻媒体介绍学会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举办和组织公开演讲、圆桌会议、小组讨论等学术活动,为决策层和专家学者提供交流讨论的平台;通过学会研究人员在社交平台不断就美国国内外问题、经济

发展、美国城市化、全球化以及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政府绩效等广泛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政策影响的渠道多元化、多样化既是学会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学会保证研究独立的重要因素,就如同多元的经费筹措使学会不会依赖某几个大的资助方一样,多通道的影响力建设使学会的政策影响力不过分依赖学会-政府这一直接的政策影响通道,而是可以通过影响社会舆论、主导议程设置等多种间接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不被政府要求和政治走向所左右,不会为了赢得政策影响力而迎合政府的观点。

(五) 极具包容的氛围和环境是保证研究独立的土壤

为了确保研究人员在没有偏见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客观研究,布鲁金斯学会并不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做出具体规定,研究人员都是凭着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独立研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研究课题,对时间的支配也有很大的灵活性;在研究过程中,学会并不刻意追求观点的统一,而是旨在提供一个多元声音争鸣的平台,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持包容和尊重态度,鼓励研究人员基于自己研究的客观事实给出不同的见解,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在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提高研究质量;在成果考核上,学会对研究人员的研究没有硬性的数量指标要求;与此同时,研究人员的观点都仅代表个人,而不是布鲁金斯学会、其董事会成员或管理人员。对于个体研究工作独立性的鼓励与保护,也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者能够提供客观的意见与研究报告,而不受来自考核指标、政治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干扰,保证了研究的独立性,为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土壤。

四、结论与启示

独立性、客观性以及高质量的研究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灵魂所在,也是布鲁金斯学会享誉世界、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从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来看,独立性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贯穿于学会所有工作的灵魂和准则。布鲁金斯学会通过建立多元丰富的筹资渠道、规定资助方的权利义务、要求研究人员的非党派性、建立多元的影响渠道以及包容宽松的工作氛围等,充分保证了学会研究的独立性,从而为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建立学会的影响力

智库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

——以美国“教育政策中心”为例

谷贤林

智库又叫思想库、智囊团，是一种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美国被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或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对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公共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分析家欧内斯特·格利菲斯（Ernest S.Griffith）就指出，尽管研究正式制度、具体组织或机构很重要，但是，研究立法者、行政人员、智库等三者之间的旋涡关系更重要，这对理解美国政府行为，把握事情未来发展更有价值。由于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起步较晚，且一直偏重于对政策文本与背景的分析，导致对智库研究的缺失，因此，本文以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简称CEP）为例，来说明智库对美国教育政策的影响。

奠定了基础。

当前，随着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号角的吹响，智库将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承担更重要的使命。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我们借鉴布鲁金斯学会的发展经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坚守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做到不唯利、不唯上、只唯实，以独立性和客观性保证研究的高质量，实现智库的影响力。

为了做到研究的独立性，首先就必须丰富筹资渠道，以财政独立保证研究独立。财政独立意味着资金不依赖于政府也不依赖于利益集团，而是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其次，制定严格的捐赠规则，从制度上切断资助方与研究的联系。严格将出资者意愿与资金使用方向分离，将资金资助与项目研究相分离，使研究能在不受任何干涉和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实现研究独立。

一、教育政策中心的发展历程

教育政策中心创建于1995年，在2006年它被美国《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评为“过去10年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十大机构之一”。作为一个关注初等与中等教育的智库，它致力于推动美国公立教育，促进公立学校的有效发展；帮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公立教育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有关公立教育互相冲突的观点并创造推动公立学校改进的条件。因此，自创立以来，它的工作主要围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及高中毕业会考和学业成就等来进行。从教育政策中心17年来的工作重心看，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2002年）：以公立教育为重心。教育政策中心的创立者认为，要改善公立学校，首先必须推动公众对公立教育的本质及存在的

再次，保障研究者充分的研究自由，以立场独立保障研究独立。鼓励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开展问题研究，不固化研究方向，不设立硬性考核标准，保障研究者充分的研究自由；同时强调研究者要立场独立，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基于事实作出判断，而不为政治走向或利益集团所左右。

最后，建立相互对话和争鸣的平台。建立智库内部的“思想市场”，问题研究不设禁区，观点不同相互争鸣，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持包容和尊重态度，鼓励内部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聚集起来进行理性和坦率的辩论，形成开诚布公的讨论，在充分竞争的多元“思想市场”上提高研究质量，建立智库的影响力。

（刘昌乾，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4年第9期）

问题进行讨论，提高公众对公立教育的了解与支持。为此，教育政策中心采取了两项行动。一是出版刊物。介绍美国公立学校的实际情况，讨论为什么要改善公立学校。如为什么要建立公立教育？公立教育的优势是什么？当前公立教育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改善？二是举办公众论坛。从1996年开始，教育政策中心在乔伊斯基基金会（Joyce Foundation）等的资助下，与伊利诺伊州家长教师协会（Illinois PTA）等不同的教育组织合作，在全美共同举办了上百场的论坛。围绕上述三个问题鼓励公众进行广泛的讨论，征求并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些论坛不仅给普通公众提供了参与讨论重大教育议题的机会，也为智库影响教育政策积累了民意。

第二阶段（2002~2006年）：重点研究《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政策问题。智库不仅需要提升公众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更需要通过客观扎实的研究清晰而简明地告诉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什么是亟待解决的、不同政策方案的利弊是什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为今后的政策修订提供智力支持。

2002年1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颁布，相对于以前的教育法案，该法案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参与程度最深、影响范围也最广的一部法案。从初等与中等教育的各个领域到学生的家庭、学校、学区及联邦政府的资源分配等无不在法案规定内。对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法案，它在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到底如何、能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在国会重新授权时需要对其哪些条款进行修改或调整，等等。收集法案实施中的经验数据，研究并解答这些问题既是智库的份内工作，也是智库提升自身地位、扩大在公众和政策制定圈中影响的资本。为此，教育政策中心发起了一系列《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影响研究项目，产出了“从首都到教室：NCLB的第X年”（From the capital to the Classroom: Year X of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的系列报告。每一年的研究报告都从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入手，数据收集涉及联邦、州、学区和学校三个层面。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不同的州《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执行条件的分析；（2）对各州在绩效问责、学生学业成就标准与评价、公立学校选择、教师发

展、英语学习者、额外教育服务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全景式的研究；（3）各界对于法案执行的态度等（见表1）。如在第一年的报告中指出，“一些州、学区和教育学者认为，绩效问责把学校改进引向了错误方向，过于关注惩罚学校，而不是为它们提供有效的改进帮助”；在第四年的报告中提到，“结果显示，法案有利的一面在于对学生提出的高学习期望、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等，而不利的一面在于给州、学区和学校以过重的资金负担等”。

表1. CEP有关NCLB年度研究报告的内容(2003~2006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主要发现	主要发现、目的、方法	概述、建议、资源等	概述与建议
1. 概述	1. 总的发展与概述	1. 学业成就与改进策略	1. 广泛的影响
2. 评价学生进步与保持学校绩效	2. 评价与绩效	2. 积极的影响与巨大的挑战	2. 学业成就
3. 提供公立学校选择和额外的教育服务	3. 公立学校的选择与额外的教育服务	3. 绩效问责	3. 绩效问责
4. 提高教师和辅导人员的素养	4. 教师与辅导人员的素养	4. 公立学校的选择	4. 提升绩效的策略
5. 使用基于科学的研究来改进教育	5. 其他问题(基于科学的研究、阅读第一、英语学习者)	5. 额外的教育服务	5. 公立学校选择
		6. 教师和辅导人员素养	6. 额外的教育服务
		7. 英语学习者	7. 教师和辅导人员的素养
			8. 英语学习者

这些成果不仅使教育政策中心成为NCLB实施过程研究的权威机构与信息源，同时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大量地吸纳了政府部门和教育界的人士，也为其扩大在下一个阶段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以举办政策论坛为重点，扩大成果的影响。通过举办论坛让公众、政策制定者、专业组织了解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想是智库经常采取的做法。从2006年开始，教育政策中心频繁举办各种会议，围绕其研究成果进行讨论。2006年10月，教育政策中心与22个教育组织一起举办了两次会议，探讨如何改进NCLB法案中的高质量教师条款（Improving NCLB's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 Provisions），并就重新授权该部分条款的原则达成了共识，最后提交给了国会。2007年3月，教育政策中心举办了关于重新授权NCLB法案中英语学习者的会议，共有25个教育组织与会。5月又举办了关于NCLB中残疾学生条款的会议，同样有25个教育组织参加。2008年，教育政策中心开启了“重新思考联邦政府在初等与中等教育中的作用”的计划，并围绕这一主题在2008年和2009年举办了一系列的公共论坛。其中有6个分论坛是在参议院、众议院内举办的。这些活动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的旨在帮助新总统和国会重塑联邦政府作用的政策建议。教育政策中心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借助专业组织的权威性与组织内的传播网络与媒介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与不同的行动者形成政策联盟，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因为，“在大多数

情况下，没有权力的团体很少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

二、教育政策中心影响美国教育政策的方式

按照美国学者的观点，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问题界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执行与政策评估阶段。从表面看，智库主要在“政策形成”和“政策评估”两个阶段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实际上，智库对政策的影响却贯穿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始终。因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这些理论上划分出来的阶段，在实践中经常是同时发生，甚至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问题确认和议程设置阶段，智库以自己的研究就已经出现或行将出现的问题向政策制定者发出提示，告诉他们在众多的教育问题中，哪个问题应当成为政策问题，并帮助政府及公众界定问题；在政策形成和采纳阶段，智库为解决教育问题提出可接受的行动与政策建议，通过参与国会听证等方式推动政党领袖、议员和政治领导人采纳自己的备选方案；在政策实施和评估阶段，智库收集政策实施过程中经验性的数据，并对政策实施结果进行逐项评估，提出修改建议然后传递给政府。就教育政策中心来说，它对美国教育政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按照卡罗尔·卫斯（Carol H. Weiss）的研究结论，事实上，并不是智库的一个或者一系列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政策，确切地说，是智库的研究结论、概念、理论视角等渗透进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塑造着立法者分析教育议题的方式，从而产生了影响。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不仅是智库将自己的观点渗透进政策过程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智库提升自己在同行和一些政策制定者心目中地位的有效途径。

国会听证会是美国政策过程中一个独特的设计，一项议案的通过需要经过众议院、参议院的各种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国会议员们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基于选举考量、政治立场、价值观或利益阐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支持或阻止议案进入下一个程序。在2007年，教育政策中心先后三次出席国会听证会，分别在参议院劳工、健康和人力资源、教育拨款小组委员会（the Senat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on Labor,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nd Education）、众议院教育

与劳工委员会的幼儿、初等和中等教育小组委员会（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du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s Subcommittee on Early Childhood,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和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du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陈述自己有关NCLB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智库的专家在听证会上作证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通过媒体的大量报道还能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除在国会听证会作证外，教育政策中心还通过递交政策简报、给政要写信、发表评论等方式来吸引政策核心层的注意。2005年后，针对NCLB法案，教育政策中心向总统、教育部等提供了7封信件，4份政策简报（Policy Brief），让日理万机的政治领导人、两党领袖与国会议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自己的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这些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政策中心对美国教育政策的潜在影响。

2. 借助大众媒体影响政策。任何一个教育问题，无论它是由突发性的偶然事件、自然灾害、某种危机引起的，还是源于教育制度本身，如果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它就不会成为教育政策问题。如果不能成为政策问题，它也就不会进入政策议程、最终成为政策。因此，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媒体作为舆论的重要制造者、新闻事件的重要评判者、信息的提供者和传递者，不管怎样都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充当民意塑造者，为政策议程设置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2）对智库研究的问题进行宣传，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引起全社会和决策者的重视；（3）影响政府和社会在教育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的偏好。教育政策中心借助的大众媒体主要有：报纸、杂志、电视与广播、网站、邮件和博客等。如1995年，在共和党时隔30年重新控制国会后，教育政策中心通过合作伙伴卡潘（Phi Delta Kappa）发行的《华盛顿快讯》（Washington Newsletter）发表了“美国教育部是否存在”的辩论材料，响应共和党撤销教育部的呼吁。从政策制定过程来说，尽管教育政策中心的提议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而成为政策问题，但是，借助该刊12.5万名左右读者的力量，它的观点却对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舆论影响方面，位列美国十大最有影响力信息来源第二位的《教育周刊》(Education Week)在1995~2011年间共引用教育政策中心创始人詹宁斯的言论520次以上。另外，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从2001年到2006年，教育政策中心创始人詹宁斯的言论被美国报纸、电视和广播引用的次数在全国排在第四位。媒体的引用次数既是教育政策中心在美国一些教育政策问题上的话语权、实力与影响力的反映，也是教育政策中心作为美国教育一些政策领域意见领袖的体现。

3. 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智库研究与政府决策的对接。所谓的“旋转门”机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在政府官员与智库工作人员两种角色之间的身份转换。以教育政策中心主席兼CEO约翰·詹宁斯为例，在创办教育政策中心之前，他在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工作了27年(1967~1994年)，先后担任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法律总顾问(subcommittee staff director and then as general counsel for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期间他几乎涉入了每一个国家层面的重大教育辩论，包括ESEA法案的重新授权、职业教育法(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残疾人教育法(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高等教育法(the Higher Education Act)、全国学校午餐法(the National School Lunch Act)、儿童营养法(the Child Nutrition Act)等。在离开国会山之后，他于1995年创建了教育政策中心，旨在建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信息中心，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可靠、无党派的决策信息。

在教育政策中心与詹宁斯一样经历角色转换的还有：戴安娜·瑞特纳(Diane Stark Rentner)、托妮·佩特(Toni Painter)等人。国家项目主管戴安娜·瑞特纳曾于1988年~1994年间担任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立法委员。中心顾问汤姆·费根1998年从美国教育部卸任，任职期间他曾负责Goal2000和Title I项目等。南茜·科博尔曾于1975年~1987年在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任立法专家。在教育政策中心的工作人员中，这种具有在国会和政府工作背景的成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在美国，一个人从政府之门进入智库之门，

或从智库之门进入政府之门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例如，2009年3月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教育部负责民权事务的助理大臣(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ivil rights)的洛斯里尼·阿里(Russlynn H. Ali)，在入阁之前，是著名智库教育托拉斯的副主席；前总统克林顿的教育顾问安德鲁·罗瑟勒姆(Andrew Rotherham)，卸任后担任了进步主义政策研究所的学校项目的主任，并创建了教育智库“教育界”(Education Sector)；而传统基金会的妮娜·里斯(Nina Shokraii Rees)和福特汉姆基金会的迈克尔·彼得里利(Michael Petrilli)则被布什总统招入教育部，由智库研究管理人员变成了政府官员。

旋转门机制一方面给智库发挥影响力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政府决策的实用性与准确性。其一，从决策来说，某项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是否能够被采纳，并不在于它是最优的，而是因为它在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是可行的。没有政府工作经历的人，尤其是学者，通常只注重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自身的完善，他们既不了解决策过程的复杂性，也缺乏让复杂问题在国会闯关的表述技巧。他们以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方式生活在大学校园里，但决策过程却是一个妥协、博弈与退让的过程。相比而言，拥有政府工作背景的人，更懂得妥协的艺术、更擅长将自己的主张与利益诉求圆融地包裹在提案中，寻求决策者的支持。其二，旋转门机制所带来的政府官员与智库工作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智库虽然在政府之外，但却与政府内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对政府的要求作出回应。美国在教育等各领域能够成为世界上决策失误率最低的国家，旋转门机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三、启示

尽管教育政策中心产生于20世纪末期，但是，美国智库却在“进步时代”就出现了。对于这个时代的特点，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和美国学者史蒂文·迪纳(Steven J. Diner)都有过精彩的描述。他们说：“我们已经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它一边摧毁了传统的机遇，一边又展示了令人激动的新前景。人们颂扬开拓的成就和史无前例的丰裕，然而又悲叹自己丧失了独立、自主，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化机制探析

——兼论优质大学智库的培育

侯定凯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集中了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主力军的高校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机制，更有效地为公共政策分析、公民社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以及经济、商业管理服务，遂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知识转化的现状及制约因素，然后结合国际经验，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不同机制；接着以知识转化机制之一的大学智库为线索，概括国内、国际大学智库实践的基本经验和特征；最后，从智库培育基金、政策分析市场、智库质量保障、多元经费投入和成果输出、智库评价等角度，对培育我国优质大学智库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机制”一词可以指“沟通渠道”“互动方式”“相互关系”等不同内涵，本文中的“机制”是指：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and 人员实现向非学术机构（如政府部门）转移或与后者建立合作、互动关系的方式和途径。

甚至自由。进步时期的美国人目睹了大公司开发的新技术生产出空前的财富，提供成百万的新职位，出售数量惊人的生活消费品，还开放了以前意想不到的人生选择。人们目睹变革的威力横扫熟谙的经济生活模式，更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重整习以为常的社会等级，还重新定义了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规则似乎都变了。日渐身处一个由大机构组成的互助社会里，为了控制自己的生活，个体美国人作了许多选择，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环顾当下的中国，一切竟与那时的美国如此地相似。就教育来说，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和其他社会的系统一样也进入了深水区，很多问题已经

一、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现状

传统学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知识积累而非知识转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贡献主要通过人才培养、政府委托项目、专业性期刊和专著、“明星”学者“个体作坊式”的知识普及等途径来实现。近年来，由于知识服务在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被重新认识和认可。同时，受到高校质量评估运动和问责制的影响，大学科研活动越来越关注“质量指标”，这些指标通常参照自然科学的惯例，主要依据文献引用率和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力来评价学者的研究水平，但这些指标难以全盘照搬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中。无论从大学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还是从科研评价机制完善的角度，我们都需要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服务的新机制。

从1999年教育部启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至今，国家已在66所高校建立了151个重点基地，基本覆盖人文社会各学科。十年来，这些基地向中央、省级单位提出咨询报告、政策建议4万份，获得中央领导批示或省部级以上部门采纳的有2155份。2003

不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通过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模仿或经验照搬就能够解决或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另外，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全球化、国际化的挑战及中国教育自身所固有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性、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世界上独一无二规模所铸就的庞大性，也让继续沿用传统的决策方式——靠经验解决问题充满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国亟需培育、建立起真正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而不是秘书处、顾问或幕僚。

（谷贤林，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原文刊载于《比较教育研究》2013年第4期）

年，教育部推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进一步把咨政服务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目标。

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近年的发展形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人文社会科学的招生快速发展（这些领域的学生数量增长率高于大学整体入学人数的增长率）（见表1）；二是研究力量的壮大。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研发人员、经费投入、项目数量、论文和专著数量等指标上持续攀升，但相关学科的知识服务水平却没有显著提升（见表2），其中2007年、2008年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研究开发项目成果数还出现了大幅下降的趋势。较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绝对产出数量，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贡献的乏力值得关注。

表1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招生的增长率（%）（2009年较2000年）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管理学	平均增长率
本科生	81.6	46.7	214.5	212.2	436.3	50.5	270.5	205.8
硕士生	316.0	62.0	352.1	570.9	548.6	274.0	128.3	321.7
博士生	192.5	129.0	370.8	298.4	315.9	170.6	244.6	246.0

表2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应用性研究成果转化项目统计（2004—2008年）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提交有关部门成果数量（项）	20119	20679	21071	15276	7570
被采纳成果数（项）	--	--	--	--	3901

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受到高校科研立项、发表、评价、推广各个管理环节的阻碍；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在性质上的差异也是需要学者和学术管理部门不断探索的。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曾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出如下区别：第一，在选题自主性方面，研究者选择基础研究问题时相对自由，而应用性研究课题要更多考虑特定使用者的需要；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基础研究学者有更大自由度来决定是否延续原来的研究思路，或者转移到那些他们认为更有趣或更有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而应用性研究一旦开始，研究者并不期望有所变动；第三，在研究成果评价方面，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者主要是科学家同行，而应用性研究的评定由科学界以外“制度化的参考群体”做出——他们的职责是促使研究成果实用化。如果观察一下目前我国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出的申请规章，不难发现学术管理部门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目标导向是模糊的，例如，基金项目申请书通常要求申请

者同时论证“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的目标。因此，厘清两类研究的不同本质和实现路径，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重要前提。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多元机制

英国科学院2008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学者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实际影响力的评价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学者们都认为这些学科的社会贡献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如表3所示，人文社会科学在“公共辩论”“文化开发”和“公民社会”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社会科学学者对于人文社科在“公共政策”方面的贡献有较高认同，并认为有更大的潜在影响可以发挥，而人文科学学者在这方面评价和期待均不高；人文、社会交叉学科的学者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在“公共辩论和文化开发”方面的影响力有较高评价；在“科学和技术”、“经济和商业”方面，学者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力评价普遍较低。

表3 人文社会学者对各自学科在不同社会领域影响的评价

受影响的社会领域	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	人文科学学者	社会科学学者	人文、社会交叉科学学者
公共政策 实际影响 潜在影响	3.45.1	2.54.4	4.66.0	3.65.5
公共辩论/文化开发 实际影响 潜在影响	4.65.6	4.75.7	3.95.4	5.05.9
公民社会 实际影响 潜在影响	4.15.1	3.74.8	4.55.6	4.15.3
科学和技术 实际影响 潜在影响	2.93.9	2.63.3	3.14.5	3.14.0
经济和商业 实际影响 潜在影响	3.03.8	2.52.9	3.64.7	3.44.1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应用可以体现为以下三种形式：（1）工具性运用，即实质性地服务于特定问题的决策；（2）符号性运用，即用研究结论为某种政策立场提供注解；（3）概念性运用，即运用理论或假设，为重新界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通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公共政策和实践的贡献并非那么直接和明显，因为决策者通常综合运用不同的概念和理论，难以清晰鉴定特定理论的贡献。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个层次不断提升的连续体，包涵以下五个层次：（1）知识传播：将研究成果传达至有关实践和专业人员；（2）认知：研究成果被实践和专业人员阅读和理解；（3）参考：研究成果被实践者的报告或行动策略所引用；（4）影响：研究成果影响了决策者选择和决定；（5）应用：研究成果

直接被实践者和专业人员采用。

从知识转化机构的运作和活动类型看，我们还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分成“学术咨询”“合同研究”“合作研究”“培训”“人员流动”等五种常见途径（见表4）。学者们参与这些活动的程度不尽相同。一项针对西班牙科研委员会下属97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团队的调查表明，学者们参与最多的是“技术咨询”和“合同研究”，其次是“合作研究”和“培训”，“人员流动”的参与频率最低。活动频率受到学科差异的影响，如经济学研究团队中“人员流动”和“培训”较为常见。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借助多学科视野和方法，因此不管什么样的活动类型，研究团队的跨学科性和多样化阅历背景都有助于提高知识转化的质量。另外，该研究表明，团队带头人的学术地位和声望也是决定知识转化质量的重要变量，因为在传统的学术晋升系统中，对于尚未获得稳定学术地位的学者来说，他们更愿意从事那些能给自己直接带来晋升机会的学术活动（而不是商业性活动）。

表4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活动类型

活动类别	定义	对知识的贡献
技术咨询	受非学术部门（企业、政府部门、专业团体）委托而提供技术、建议和咨询服务	短期内完成知识应用
合同研究	根据与非学术部门订立的合同而开展应用性研究活动	产生新知识
合作研究	受非学术部门委托，双方共同参与研发项目	产生新知识
培训	应非学术部门要求而组织“量身定制”的课程或其他活动	短期内完成知识应用
人员流动	学术人员在大学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临时性流动，如到企业担任顾问	短期内完成知识应用

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方式和类型的多样性，意味着高校的知识转化政策和评估制度需要分层、分类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多样性，也决定了知识转化的成果形式必然是异彩纷呈的。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服务形态中，以稳定的专家（通常来自多学科）团队形式运作，为政府在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决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支持的“智库”（think tanks），是人文社科知识服务的有效载体之一。而以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为己任的大学，在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过程中理应有更多担当。下文将简要介绍国际上大学智库的发展情况，分析我国大学智库的现状及其问题。

三、大学智库的发展：国际比较及中国现状

1. 国外大学智库的发展概况。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0年发布的全球智库调查报告，以资源投入、

对专家的吸引力、与决策精英和媒体的互动、完成重大项目的能力、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社会影响力等为评估指标，列举了全球25家最佳大学智库（Best University-Affiliated Think Tanks）（见表5），其中有11家来自美国，其余智库分布在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虽然胡佛研究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等个别机构成立时间较早（甚至早于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但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大学智库建立最为集中的阶段，而上世纪80-90年代也是欧美国国家智库整体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

表5 世界最佳大学智库一览表

排名	机构名称	所在院校	国家	成立时间
1	胡佛研究院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919年
2	贝尔弗科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	美国	1973年
3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	美国	1998年
4	高等研究院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1930年
5	地球研究所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1995年
6	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	-
7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巴黎政治学院	法国	1952年
8	约翰·M·奥林战略研究所	哈佛大学	美国	1989年
9	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983年
10	国防研究中心	伦敦国王学院	英国	1990年
11	发展研究所	萨塞克斯大学	英国	1966年
12	全球化研究中心	耶鲁大学	美国	2001年
13	拉贾拉南国际问题研究院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1996年
14	发展研究中心	波恩大学	德国	1995年
15	非洲经济研究中心	牛津大学	英国	1986年
16	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	赖斯大学	美国	1993年
17	安全问题研究中心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瑞士	1986年
18	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俄罗斯	1944年
19	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1966年
20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		哥斯达黎加	1957年
21	政策研究中心	中欧大学	匈牙利	2000年
22	东南亚研究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1968年
23	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	斯坦福大学	美国	1983年
24	人类安全报告项目	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	2007年
25	全球化与发展研究中心	邦德大学	澳大利亚	2007年

美国大学智库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得益于其国内特殊的环境：分散化的政治和决策制度、发达的“政策企业家精神”（policy entrepreneurship）和多元、充沛的经费投入。与美国智库发展鲜明的民间性形成对照，近年来欧洲的大学智库发展更多受到政府力量的驱动。例如，欧盟委员会为整合各成员国的教育和科研活动而设立了各类咨询项目，这些项目为大学智库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费支持和发展机遇。以“让·莫内项目”为例，目前该项目已在全球68个国家的760所大学设立了欧洲问题教学和研究项目（我国的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参与其中）。欧洲大学智库的研究主题涉及欧盟各个政策领域：欧洲一体化；全球治理；欧盟外交、安全与防务；经济与金融等。虽然大学智库在欧洲的地理分布较为分散，但是通常大学智库的地位与

所在国家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国家，那里的大学智库活动也越活跃。

2. 优质大学智库的基本特征。与其他智库一样，大学智库通常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发挥作用：(1) 政府决策的“外脑”：更敏锐地发现问题，提供决策方案；(2) 启迪民众：以通俗的方式向民众传播政策分析和信息；(3) 监督政府权力运用：定期提供基于客观事实和数据的政策评估；(4) 为边缘社会群体代言：将社会边缘阶层的声音传送到决策层，为他们争取基本权益，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公平和公正。

尽管世界各国智库的类型、规模、功能、政治取向各异，但成熟的智库具有一些基本的成功要素。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迪尔克·梅斯纳指出，一个严肃、可信的智库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三个要素：(1) 出众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利益组织保持距离，保证所提出建议尽可能以解决问题为目的；(2) 与决策者保持联系，以获取切合实际的信息；(3) 开展国际合作，以恰当地处理全球化挑战。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约翰·桑顿在北京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谈到了该学会奉行的三大核心价值：(1) 质量：由各领域最优秀的学者把思想变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2) 独立：虽受惠于多个赞助者，依然从事独立、公正的研究；(3) 影响力：不仅是发表成果或提出有意思的思想，更需要广泛的宣传。可见，优秀智库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强调研究的独立性、高品质和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3. 我国大学智库的发展现状、障碍和潜力。有学者估计，目前我国的大学拥有约700-800家可以称为“智库”的研究机构，比较而言，政府直属的政策机构约有200家。尽管如此，发挥更大影响力、占有更重要地位的，是那些大学以外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如中国社科院）。因远离政府决策中心，加之学术化、理论化、学科本位、活动“个体化”的特点，我国大学智库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院校（如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开等）建立起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外交、经济政策的研究机构，并开始与世界顶级智库建立合作关系（如清华大学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建立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我国的大学智库还体现出某种“地缘政治”特点，

如，云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建立了东南亚、西藏问题的研究机构；厦门大学设有台湾研究院。一些院校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着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智库“品牌”。

必须看到，除了政府决策大环境的不利因素，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还存在着阻碍大学智库发展的诸多因素：(1) 从研究文化看，政策研究成果还远不如传统学术研究更容易获得正式认可；(2) 大学政策研究的影响力（如果存在这样的影响力的话）主要以研究者个人名义，而非研究团队的名义呈现在公众面前；(3) 除了少数政策研究者，多数研究机构和人员难以直接接触决策部门，研究者和决策部门的联系有赖于“关系”和资历；(4) 大学政策研究面临严峻的活动资金困难，研究经费资助的渠道单一且竞争异常激烈；(5) 在评价制度方面，获得政府官员的“批示”是政策研究者能获得的最好褒奖，但这样的评价方式可能淹没数量更大、水平更高的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

反观政府所属的智库，也普遍存在与体制距离过近、专业化程度较低、过分注重经济利益等弊端，而大学的学术生态有助于大学智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学学者群体中的学术和社会批判精神、对知识的非功利性追求、多学科文化的交融、密切的国际学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大学智库完成“独立”和“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近年来，大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入国内大学寻求发展机会，这些学者带来的多样化学术思维方式，可以克服某些官僚智库的僵化工作思路，归国学者的国际学术网络也是实现智库专家国际合作的良好基础。当然，经院式的传统思维和话语方式、缺乏本土人文关怀的学术取向，也是大学智库发展壮大的重要障碍。为此，中国大学智库需要不断革新学术思维、话语体系和知识推广模式，以切实提高在国内、国际政策分析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政府决策中的发言权。

四、建立优质大学智库的构想

与自然科学的知识转化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化的成果和效益通常是无形和潜在的，并具有更强的公益特性；人文社会学科对于特定社会、文化的依存度也比自然科学更大。虽然本文使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称谓，但是在学科不断分化和综合、交叉的今天，我们很难笼统地提

出普遍有效的知识转化途径和机制。我们还必须承认：人文社会科学中必然存在大量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抑或主要服务于知识积累和创造的研究活动，这些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应用和转化活动同样有价值。

就智库建设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智库建设都需要面对权力、财富和知识三者的复杂关系。首先，大学智库需要避免成为“政策合法化工具”——仅满足于为既定政策做“背书”。政府智库通常更关注宏观政策和议题，大学智库可以更加注重“地方性”和“过程性”研究，这或许比“全局性”研究更有现实意义。另外，面对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公众对社会公正、公平的强烈诉求和“专家”“知识”在社会服务中不断遭遇的信任危机，大学智库需力戒成为政府以外的其他赞助者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防背离大学智库公益性的基本要务。

围绕培育优质大学智库的设想，我们提出如下政策性建议：

1. 设立大学智库专项基金，培育优质智库团队。政府设立专门的大学智库培育基金，以项目为依托，侧重跨学科团队建设，在不同政策领域培育若干智库“雏形”。通过优胜劣汰机制，遵循“项目驱动—团队建设—品牌营造”的建设过程，最后确立若干稳定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大学智库。

2. 培育政策分析市场。政府应加大对大学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方面服务的采购力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更加主动地跟踪决策部门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学术界之间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大学智库应该在一个包括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学术机构等多元主体的政策分析市场中占有独特的位置。

3. 保证智库研究的质量。高品质的政策研究需要将专业的政策研究方法和科学、理性精神结合起来。高品质政策研究必须基于实地调查，同时更多关注“民意”和“常识”。大学智库还需要谨慎

地处理好政策研究的科学性和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大学智库需要从人才选拔和配置、研究过程参与的广泛度、成果传播和品牌建设等角度，保证成果质量的持续提高。

4. 通过经费的多元投入，提高大学智库的独立性。鼓励大学智库从政府研究基金、民间资本、社会公益基金、外国资金等多种渠道获得研究经费。多元经费投入是最大限度确保智库研究客观性和独立性的需要。

5. 多层次、多形式输出成果，提升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大学智库应该被赋权在不同场合（期刊论文、专题会议、专著、网站、大众媒体等）以适当方式发表研究成果，以接受公众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辩论。智库成果应追求可读性、通俗性、可操作性。可通过邀请国际知名智库专家加入、组织国际专门会议、将研究报告翻译成外文、完善网站建设等途径，提升我国大学智库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同时，需要把大学智库建设与政策分析专门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

6. 建构有利于大学智库发展的科研评价制度。大学和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突破倚重“学术论文、纵向课题、学术内部评价”的科研评价传统，真正将知识转移的贡献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中。结合国际经验，我们提出四方面的大学智库评估指标：(1)资源投入：聚集一流专家的能力；经费筹集数量；接近决策部门和政策精英的可能性；在政策、学术界和媒体领域的网络关系等。(2)实践性：及时完成重大研究项目的执行能力；专家被官方任命担任顾问的人数等。(3)产出：研究报告的数量和质量；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出版物（报告或专著）数量和质量；组织专门会议的数量和层次；人才输出等。(4)影响力：媒体曝光率或文献被引用的数量；网站点击量；建议被采纳的比例等。

（侯定凯，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复旦教育论坛》2011年第5期）

大学智库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基础

王莉丽

大学智库充分发挥思想创新、政策建言、影响舆论的重要作用，可以逐渐承担起为政府培养人才的作用，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并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传播的主力军。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各国间的竞争已不仅仅是“硬实力”，以思想、观念、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已成为新的竞争点，而智库作为国家思想创新的动力源泉，是“软实力”竞争的关键。

智库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是指战争期间美军用来讨论作战计划的密室，后来泛指一切以政策研究为己任、兼顾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的发展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21世纪是中国高速发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发展的中国需要形成、汇集世界级水平和影响力群体的智力支持，中国的智库应首先出现在大学。中国的大学智库将承担起思想创新、政策建议、人才培养、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

大学智库事关国家发展

近年来，智库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已引起了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有学者认为，智库是思想掮客，是政治议题设置者和政策倡导者；也有学者认为，智库协助外交团队出谋划策，在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有学者认为，智库是国家决策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影子政府”。

世界各国智库根据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可分为三类：官方智库、大学智库与民间智库。目前，全球共有6480家智库，美国有1815家。在美国众多智库中，半数为依托大学的研究机构。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大学一直发挥着国家主要智库职能，之后随着国家决策咨询服务的专业化，校外专业型智库产生并有选择地替代了高校智库职能，但高校智库仍是智库的重要组成，与官方智库、独立智库构成美国智库的“三驾马车”。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

大概有2000多家，数量甚至超过智库最发达的美国。从数量上来看，应该说中美两国都属于智库发展的大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至今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尽管数量很多，但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却与美国智库存在很大差距。目前，中国的官方智库发展得比较成熟，数量众多，影响力很大。民间智库数量少、影响力薄弱，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大学智库数量很多，但是由于缺乏相对稳定与科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在政策制定领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优势。在目前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大环境下，中国的大学智库最具备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的必要条件。推进中国大学智库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大学智库建设任重道远

相对于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而言，大学智库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良好的氛围；其次，大学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再其次，大学具有学科综合的优势；最后，大学的信息资料丰富，对外交流积极。当然，中国大学智库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学内研究机构众多，缺乏清晰的智库定位、资源分散，研究水平良莠不齐，影响力难以充分发挥、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上存在问题；大学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学生服务、社会服务四重任务和角色，严重缺乏在政策研究上的时间与精力；大学的科研考核体系普遍以学术研究、基础研究为重，对智库所从事的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缺乏科学、灵活的考核机制，缺乏对智库研究人员思想成果和社会贡献的应有认可与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大学教师从事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大学智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大学智库发展的图景与路径

展望中国大学智库的发展，理想的发展图景是：大学智库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推动大学自身的发

展；大学智库充分发挥思想创新、政策建言、影响舆论的重要作用；大学智库可以逐渐承担起为政府培养人才的作用；大学智库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加强与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公共外交和国际政治传播的主力军。

以此为目标，中国大学智库应该从组织架构、人才选用、资金来源、影响力拓展、管理考核等几个层面进行大力度改革。

政府的责任是，在政策上为大学智库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人事及科研管理上，为大学智库的发展制定合理法规以形成科学机制；在宏观上，全面把握中国大学智库的整体发展布局；在资金上，为大学智库的发展提供一定保障；在影响力拓展上，共同构建一定的渠道。

大学要从智库发展的角度，建立科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目前，大学内类似于智库或者具有智库特点的各种研究机构数量众多，但资源分散、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合力、做大做强，发挥出智库应有的功能和影响力。智库所从事的是针对现实与长远的对策研究，而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类的纯学术研究。在人才选拔上，大学管理机构要“不拘一格”，以开放的思维选拔启用青年才俊、复合型人才，为智库人才创造适宜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要制定出一套对大学智库研究人员有激励和凝聚作用的灵活考核制度，以期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大学智库精英。

大学智库建立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影响政策

和舆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大学智库的影响力可分为“向上”与“向下”、“对内”与“对外”四个维度。“向上”指的是大学智库对政策决策者的影响力，“向下”指的是大学智库要影响社会、教育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世界。“对内”是指大学智库在国内的影响力，“对外”则是强调国际影响力。为了拓展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学智库要与世界各国智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交流机制，这一方面缘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应对，另一方面是为国家大外交战略建立若干重要通道，呼应国外智库，影响国外舆论和政策。

大学智库的发展要突出责任意识、全球意识和品牌意识。“责任意识”是指从事大学智库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从国家利益、社会进步与民生角度出发，大胆建言。“全球意识”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大学智库的领导者们要站在全球的视角考虑智库的发展战略；二是专家学者们研究政策问题时一定要有全球意识；三是大学智库不但要影响本国政策，还要走出中国，呼应世界；四是当今世界各国间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需要各国智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品牌意识”指的是大学智库围绕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来构建整体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品牌的传播和推广。

（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72）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12年5月25日）

英国高校教育智库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研究

——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为例

郭 婧

从现代意义上讲，智库主要是指为政府部门或大的社会团体、企业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决策进行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提供各类咨询，为其解决具体问题，并为之培养、储备和输送人才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教育智库则是由教育专家和其他相关学科专家共同组成的，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提供处理教育问题的专业思想、理论与策略，并为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公共科研机构。

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的发源地，其智库发展水平仅次于美国。在《2013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 Global Go to Think Tank-Index & Abridged Report）中，英国共有16家智库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2家智库位列教育政策专业领域全球顶尖智库前50名。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简称IOE）即是教育政策领域智库之一，也是唯一一家以整个学校为单位的高校教育智库。作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高校教育智库，它无论在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还是在提供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对大学依附型智库的建设树立了典范。

一、IOE教育智库的发展历程

IOE是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联盟中的一所独立自主的研究生学院，是英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专门从事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1900年，伦敦郡议会技术教育委员会（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的高等教育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教师培训的报告，并建议伦敦大学创建一所新型的男女同校的教师培训机构。

在此提议下，1902年10月6日，IOE前身——“伦敦日间培训学院”（London Day Training College）成立，旨在为伦敦地区培训中小学教师。当时只招收有经验的在职教师前来深造培训，第

一批学员仅有58人。1907年，伦敦日间培训学院成为伦敦大学下属机构；一战后，开始设立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由伦敦大学完全接管，正式更名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简称IOE）；二战后，学院规模逐渐扩大；1949年开始以“地区培训组织”（ATO）形式存在，发展成包含30多个教育学院的大型联合机构。20世纪70年代，IOE进入发展困顿期，由于当时公众对教育的不信任，它在重重困难中挣扎生存，并调整重组，在应对政治与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寻找新出路。

进入21世纪，IOE通过“矩阵管理模式”改革，通过英国大学科研水平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在教育及相关社会科学领域中凸显国际领袖地位。它借助在教育学科及相关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长，搭建多学科学术碰撞的平台，促进教育及相关领域理论的发展，为教育政策咨询积累成果，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奠定基础，并引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IOE拥有教育及相关领域的世界一流专家、学者的人数是任何其他英国大学的5倍以上。他们专注于教育学科建设，学习科学相关研究，课程、文化与知识研究，儿童、家庭与早期教育，长期社会跟踪研究等方面的理论探究。

自2007-2008学年起，虽然IOE仍保留在伦敦大学联盟之内，但它已开始独立颁发学位。经过110余年的发展，IOE学生规模已经超过7,600人，拥有英国教育领域最大的博士生学院，生源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2014年，它在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教育学）中位居全球首位。目前，它不仅是英国中小学教师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的重要场所，其教育活动和社会服务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宽，其师生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国际组织进行教

育研究,运用专业力量影响全球教育政策走向。

二、IOE教育智库运作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曾经指出,“专业智库处于一线,占据影响政府决策的前台;大学智库则处于二线,位居影响政府决策的后台”。作为大学依附型智库,IOE围绕“四位一体”的运作路径,塑造教育决策智囊角色,提升其在英国乃至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力,其运作的基本路径为传播教育知识、培养务实人才、服务公共社会和提供决策咨询等。

1. 传播教育知识。大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传递、保存、丰富和更新知识;每一代学者都把前任所积累的知识保存下来,传播开去,同时开辟新的知识领域,改变知识边界,进行知识更新。英国大学科研水平评估(RAE)2008年评估结果显示,IOE的教学研究人员每年要完成超过400份教育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通过各种渠道展现给其他教育研究者、实践者、决策者和普通公众。

传播与应用教育相关知识是IOE增强教育与社会实践、为教育系统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基本手段。IOE向学术界、决策者和公众发布教育研究成果,传播教育、经济、政治等相关领域知识的方式主要有3种:①同步发表期刊、书籍和网络新闻的纸质和电子版;②定期举办教育相关热点话题的学术讲座、研讨会、培训班、短期课程和主题活动,扩大学术影响力;③组织大型国际研讨会发布先进的研究成果、传播教育发展理念,并探讨重大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等。IOE的研究、咨询与知识转化委员会(Research, Consultancy and Knowledge Transfer)对教育研究成果的传播起到质量监控和伦理道德监督的作用。

2. 培养务实人才。IOE在教育及相关专业学术资源上独具优势,是整个欧洲地区教育及相关专业人才和知识最为集中的地方,它通过完善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为英国乃至欧洲国家培养教育领域务实人才。2012-2013学年IOE的在读学生中,攻读授课型硕士学位的人数占53%、参加教师培训的占26%、攻读研究型学位的占12%、攻读文凭及证书课程的占7%、攻读学士学位的占2%。每年有超过1200名本科毕业生前来申请“研究生教育证书”(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简称PGCE)项目,参加以大学为教学、以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

一年制PGCE课程,成长为服务英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实践型人才。

在过去的10年中,IOE已与伦敦地区的600多所中小学和学院建立了合作联系,为它们提供教师在职专业发展培训,培训的教师人数超过10000人。除了为教育系统输送教育教学实践人才,IOE还为世界各国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和公共事业部门、国际组织、高等教育机构、教育研究机构培养教育志愿志愿服务者、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教育政策的分析者、制定者和决策者,以及在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和精英等。

3. 服务公共社会。IOE的发展理念认为,教育是影响人类完满生活和社会公正、繁荣的根本要素,有必要“支持公众对教育与社会研究的参与”。因此,IOE用其专业的研究与实践,推进人们对教育及相关领域社会科学的认知与理解,并在最大意义上发挥教育对所有人的影响。除了向学术界公布研究成果外,它还会用通俗的语言将研究成果概括后提供给公众阅读。而且,IOE众多研究中心都会提供公共社会服务,使其学术成果惠及民众,并在社会生活中实践。

以“长期追踪研究中心”(Centre for Longitudinal Studies,简称CLS)开展的3项被誉为“社会研究王冠上的珍珠”的世代群体研究为例——“1958年国家儿童发展研究”(1958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简称NCDS)、“1970年英国人群研究”(1970 British Cohort Study,简称BCS70)和“千禧世代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简称MCS),通过对3个年龄群体的长期跟踪调查,揭示英国社会中健康、财富、教育、家庭和就业对人们发展的影响,并且分析影响社会变化的因素。研究结果为帮助英国民众了解本国社会、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问题提供了基本参考,也为英国社会发展与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

4. 提供决策咨询。高校教育智库最根本的职能就是对中长期教育及社会重点问题提出“预警”,通过制定教育政策问题框架、提供相关问题背景信息和国际经验借鉴、递交教育决策咨询报告等方式,提醒政府防止出现重大教育政策失误和偏差,为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IOE自成立以来，一直扮演着英国政府教育相关部门智囊团的角色。仅就1902-2014年间IOE的11任院长来看，他们基本都有中央或地方政府教育部门、教育研究机构、国际教育组织等全职或兼职工作的经历，并对伦敦地区、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教育发展提出过重要的政策建议。如首任院长乔·亚当斯（Jone Adames）就担任过伦敦儿童研究中心副主席、大学监督委员会副主席等，是伦敦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促进者；第二任院长沛西·能（Percy Nunn）曾担任英国教育委员会委员、儿童委员会成员和考试调查中心委员，起草过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教育报告；第三任院长弗莱德·克拉克（Fred Clark）是英国新教育团体主要成员、殖民地教育咨询人员以及麦克内尔委员会成员，参与起草全面改革英国师范教育的《麦克内尔报告》（McNair Report）。

进入21世纪以来，IOE教学研究人员的意识越来越认识到智库角色对于将教育相关研究成果传递给决策者的重要意义，他们“直接与一线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共同开展研究工作”，这种合作关系使研究者本身成为政策制定、分析、实施与评估的参与者，其研究成果往往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给教育领导者和决策者。为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提供的“高等教育参与及财政”（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and Funding）调查报告、为工党政府提供的“儿童信托基金计划”（IOE research underpinning the Child Trust Fund Scheme）基础研究、向英国教育与技能部提出建议的“为医疗系统中的监护人员提供高校进修机会”（Going to University from Care）项目、为英国卫生部服务的“新生儿血液筛查”（Communication about neonatal blood spot screening）研究、向英国贸易与工业部提交的为提升英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游戏制作”计划（Making Games project）、受儿童、学校和家庭部（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委托的“音乐教育”研究（Music Education）等项目被公认为近年来智库角色下，IOE影响英国政府教育部门决策的最佳案例。

三、IOE教育智库运作的资源保障

IOE作为英国教育知识、教育智慧和教育思想最重要的集散地，在探究教育问题、为公共教育政

策献计献策的过程中，得益于来自理论基础、科研经费、信息资源和媒体网络等智库思想传播要素的支撑与保障。

1. 理论研究基础。在IOE创办之初，乔·亚当斯就坚信教师培训必须“让教师获得在日常工作中关于学生的本质与发展的知识”，他提倡在教育研究过程中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并且通过演讲和报告等形式对教学理论进行学术探讨，改变人们对教育学的偏见；随后，沛西·能更进一步提升IOE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的影响，他的著作《教育原理》堪称“教育专家和研究者的《圣经》”，大力推动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的进步。

此后的专家学者，如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对幼儿发展和早期教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门汉（K. Mannheim）、劳锐思（Joseph Lauwerys）、埃德蒙·金（Edmund King）、里德（Louis Arnaud Reid）、布劳格（Mark Blaug）等在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工作。IOE不仅注重教育专业学理，更重视对教育发展和人类成长密切相关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探究，倡导跨学科理论的应用，为透视教育现实、提供教育政策建议夯实了思想基础。

2. 科研财政经费。英国智库研究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含慈善机构）和个人捐赠、信贷支持、研究委托等5大渠道。据观察，英国智库获取资金的额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机构对决策影响力的高低。

IOE的财政收入大约7141.5万英镑，通常来自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E）拨款、学费、研究资助和合同、其他经营收入和捐赠与投资收入等，其中研究资助经费1331.6万英镑，占到学校总收入的18.64%，这相当于英国所有高校开展教育研究项目经费总额的25%。这些科研资助经费主要来自于英国研究委员会（UK Research Councils）和英国政府的拨款，以及英国慈善机构、其他捐赠项目和欧洲其他各国政府的研究委托等，这些机构组织对IOE研究经费的资助比例分别占48%、23%、11%、8%、10%。

3. 信息数据资源。IOE拥有大量的馆藏与在

线教育资源，并且调查数据与研究成果形成最具影响力的教育研究数据库，专门开设“教育循证研究门户”网站（Research Portal），与其他30余家教育研究机构共同通过这个门户网站分享调查数据和研究成果，为教育智库运作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IOE的纽萨姆图书馆（Newsam Library）是欧洲教育学术研究藏书和期刊馆量最大的图书馆。

纽萨姆图书馆拥有来自全球的30万册图书和近4000种电子期刊和2000种纸质期刊，教育资源平台由核心馆藏、基础技能资源中心（Basic Skills Agency Resource Centre）、专门馆藏和档案馆4部分组成。核心馆藏涵盖所有与英国教育相关的出版物、国际组织教育相关出版物和英国教育数据、工具书、索引、法律法规等教育参考资料，以及大量的教育相关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的出版物；基础技能资源中心拥有成人教育教学资源和基础技能教育资源；专门馆藏针对23类教育相关领域研究的出版物进行专门的资源整合，包括最完整的英国教育文件资源、全英教科书资源、稀缺且珍贵的教育史资源、全英所有层次所有学科的教育教学资料等；档案馆收集了20世纪以来IOE、世界教育协会（World Education Fellowship）、全英女教师工会（National Union of Women Teachers）等教育相关机构的详细史料，以及世界知名教育家、教育组织、教育项目的文档资料等。

4. 媒体推广平台。任何一个教育问题，无论是偶发性事件、由某种危机引起的、还是源于教育制度本身，如果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它就很难成为教育政策问题，进而无法进入政策议程，最终成为教育政策。在信息化时代，媒体是公共舆论的制造者、评判者和信息传递者，因此，教育智库与大众媒体的关系是教育咨询政策能否成功被采纳、并在社会生活中传播的关键。

IOE通过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HE）、《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和《卫报》（The Guardian）等重要报纸媒介上发表文章或刊登研究报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教育与社会相关节目的专访，如第4电台（Radio 4）的“今日”节目（the Today Programme）；通过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网络发布学术信息等。2013年，IOE的研究成果至少在英国重要媒体中出现43次。通过媒体的宣传，不但可以迅速地将这些成果推广至一线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且通过社会的热议引起政府部门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为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成教育咨政报告甚至是教育政策内容提供机会。

四、IOE教育智库服务的社会影响及启示

IOE作为全球顶级的高校教育智库，其战略定位不仅取决于英国和伦敦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更取决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共同实现全纳教育、公平教育和优质教育的理念走向。我国当下正处在教育改革的关键期，应当充分发挥教育智库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IOE教育智库的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为我国的高校智库建设提供了实践参照。

1. 扎根城市中心，推动伦敦教育发展。IOE与大伦敦地方当局（Great London Authority）、伦敦的教育工作者、社会合作伙伴及其他关注教育发展的公众广泛合作，通过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伦敦建设为世界一流的学习型城市及知识型首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是由28个机构组成的“伦敦咨询顾问组织”（London Consultative Group）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的核心使命是：代表伦敦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根据伦敦市民和伦敦城市发展的需求，提出并磋商教育相关政策建议，共同为伦敦的儿童与青年创建公平的教育系统，为成人开放终身学习的教育机会，进而支持伦敦的经济、公民和文化的发展。此外，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设有7个专门与伦敦城市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为伦敦建设为“全球城市”出谋划策（见表1）。

表1 IOE与伦敦城市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及其研究重点

中心名称	重点研究领域
“为伦敦而学习”中心（LFL@IOE）	专门致力于伦敦相关的研究、咨询和知识转化活动，已成为伦敦教育与健康相关领域研究的领军团队，与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引领循证创新导向的教育政策改革与实践。
“14岁以上学习者创新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st-14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旨在通过独立研究、与教育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和社区研究者的访谈，创建一个针对14岁以上人群的全纳性、高表现性的教育与培训体系。“伦敦地区14岁以上人群研究网”（London for Post-14 Regional Network）已开办30余年，目前由“14岁以上学习者创新研究中心”主办，主要聚集决策者、社区研究者和实践者探讨14-19岁学生教育和终身学习问题。

“伦敦卓越教师培训中心” (LONCETT)	是由学习与技能改进服务部门 (Learning and Skills Improvement Service) 资助的 11 个英国卓越教师培训中心的区域中心之一, 终身学习部门是开发和分享教师培训实践案例与模式的平台。
“伦敦领导力学习中心” (LCLL)	主要任务是对教育及其他公共部门的领导力进行研究, 改善伦敦、英国乃至全球教育及公共部门领导力的提升。
“伦敦知识实验室” (LKL)	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与伯贝克学院 (Birkbeck College) 的跨学科合作平台, 由 50 名社会科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组成, 利用数字技术研究人类学习过程和知识构建过程。
“伦敦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中心” (STEM Education Centre London)	为伦敦各级学校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教师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发展活动, 为伦敦科学等相关学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各类课程开发、教学研究及相关的推广活动。
“特殊教育需求联合初始培训”中心 (SENJIT)	已经具有 20 多年的研究经验, 由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与 36 家当地教育权威机构合作, 主要对伦敦当地服务于特殊需求教育与残疾人教育的教师和专业人士提供课程、研究、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

2. 拓展服务平台, 提升国际教育咨询影响。IOE不仅在师资与生源方面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 其科学研究与政策咨询的合作伙伴也遍及各大洲。同时, 它还注重与国际高端教育智库合作, 为世界各国政府、教育相关机构、慈善机构和私营部门, 以及全球重要的国际组织提供研究数据、成果及咨询报告。IOE最新的国际化战略是在全球视野下广泛开展国际伙伴关系, 互惠互利、协调合作, 为实现全球教育公平愿景探索出路。

2007年,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等发起成立全球第一教育智库“国际顶尖教育学院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Leading Education Institutes, 简称IALEI), 目前成员包括全球最为知名的10所高校教育学院(部), 除上述3家外, 还包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教育学院、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教育学院、南非开普敦大学教育学院和巴西圣保罗大学教育学院。这些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院间的强强合作, 为国际教育学术界、国际和各国公共教育政策提供支持。2013年11月, 10所教育学院(部)的院(部)长在北京签署新联盟备忘录, 新联盟更名为“国际顶尖教育学院

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ducation Institute, 简称INEI)。通过这样的教育咨询平台, IOE为更多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及教育组织呈现教育事实依据, 并为其教育改革与发展献策建言。

IOE国际教育政策咨询范围十分广泛, 从日常的在职教师培训到长期的社会跟踪研究, 从单一的专家顾问到跨学科的团队咨询, 从教育事业发展到卫生健康服务、地方政府治理、高等教育机构职能等方方面面。IOE的学者每年都会协助几十个国家解决教育发展问题, 完善教育系统与实践。他们通常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根据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的需求, 提出适切的应对策略和项目设计。

3. 树立智库典范, 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建设提供参考。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人的问题》中指出, “今日的教育问题是更深刻的、更尖锐的、更困难的, 因为它要面对近代世界的一切问题”。面对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为教育发展带来的专业化与复杂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机构的社会服务形式, 即高校教育智库开始体现其多元化服务功能。IOE的专家与学者在英国乃至世界各国教育发展过程中, 凭借其夯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切实的政策分析与建议, 不断强化着其全球顶级教育智库的角色与影响。同时, IOE始终与中国教育界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关注中国教育相关领域的发展, 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上, 为我国高校教育智库的发展模式提供借鉴与参考。

如今, 高校教育智库也已经成为我国高端智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育智慧、教育知识、教育精神与教育理念产生、汇集与传播的场所; 高校依托智库知识服务的有效载体为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等领域提供理论、策略与方法的支持。在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应以教育及相关领域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 以学科特色和跨学科融合为依托, 形成周密切实的研究战略, 创新教育教学机制以培养智库人才, 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搜集、分析并传播可靠的数据信息资源, 善用载体对研究成果进行宣传与推广。

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高校教育智库还特别需要办出“特色”, 聚焦研究专长领域、形成专业人才特区、实施集体攻关项目、提供专项资源数据,

美国一流高校智库人员配置与管理模式研究

——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例

陈英霞 刘昊

智库指通过多学科专家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及公共媒体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舆论的公共研究机构，其主旨在于影响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民主社会项目》的研究，目前世界上有6,603家智库，遍及世界各地。智库按照隶属关系，可以分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大学隶属智库等。

本文聚焦于高校隶属智库人员配置与管理模式的研究，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个案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分析。选择胡佛研究所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世界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曾说：“一个顶级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智库的质量是智库立足的基础，而智库的质量则由其研究人员的水平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所决定，所以人员的配置与使用对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2）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高校隶属智库的典型代表，具有标杆意义。在2009年度和2010年度的世界智库排名中，都是唯一进入前10名的大学隶属智库，对胡佛研究所的人员配置模式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高校建设一流智库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胡佛研究所成为著名智库的背景分析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是斯坦福大学的校级研究机构之一，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保守主义智库。它由斯坦福大学的校友、美国第31任总统（任期1929~1933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于1919年创设，初期以战争资料图书馆的

性质存在，1946年开始延伸到研究领域，以“致力于收集战争期间及改革时期的资料，在研究中寻找出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为核心使命。

胡佛研究所由单纯的图书馆转变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智库，既是美国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产物，也得益于斯坦福大学雄厚的学科支撑和学术声誉的传播。

（一）借助国家政治制度，进入政府视野

美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制度导致的权力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开放，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机，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选举渠道的差异，以及政党轮替、竞争政治导致的政党利益差异，也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在美国的施政体系中，从竞选纲领、行政决策到内政外交都需要专业化的知识，总统候选人、国会议员或行政官员势必需要借助“外脑”，智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胡佛研究所由图书馆成功转变为知名智库，发生在里根总统的竞选和当选阶段。里根是胡佛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为其竞选纲领和竞选理念的传播贡献了最大的力量，而里根当政之后，胡佛研究所的多位研究人员在政府的内政、外交序列里担任重要职位。在通过研究人员的华丽转身彰显影响力的同时，胡佛研究所抓住这一时机，大规模地聘用人员致力于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和国际事务两大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早期4个引导美国经济政策向正确方向发展的研究所之一。

以高水平的专业团队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面向社会、面向政府、面向国际，通过建设具有特色的“教育研究高地”提供对话平台，以提升我国高校教育智库在大众生活中的影响力、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以及在国际教育交流中的话语影响力，

为我国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制定、为国家和城市发展、为世界教育的全纳与公平贡献科学参考。

（郭婧，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4年第9期）

胡佛研究所的第二次影响力的提升得益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组建的百人专家团队中多数来自胡佛研究所，其中包括后来任布什政府安全顾问及连任后任国务卿的赖斯、帮助布什处理经济事务的约翰·泰勒等。

（二）融合大学多学科力量，提升研究质量

斯坦福大学将胡佛研究所在学校中的定位概括为“线性加速器中心”，是斯坦福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顶级高校，斯坦福大学的很多学科都在全美和世界排名中位居前列，拥有大批顶尖的师资力量和原始知识创新，这为胡佛研究所的发展奠定了与其他类型智库相比不可多得的良好基础。而胡佛研究所作为智库，其主旨是将大学创造的原始知识更快地转化为政策研究，通过胡佛研究所与政商界之间的旋转机制，为斯坦福大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声誉的扩散提供了契机。正如胡佛研究所主任约翰·雷西亚（John Raisian）对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关系的界定：“胡佛的公共政策取向和斯坦福强大的学术支撑是一种强大的融合，二者之间具有巨大的协同效应与互补性。”

胡佛研究所与斯坦福大学之间除了在研究上的互补之外，还体现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和财务隶属上。胡佛研究所是斯坦福大学下属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胡佛研究所的主任和斯坦福大学其他学院的院长一样属于斯坦福大学内阁成员；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是胡佛研究所监事会的成员，而且胡佛研究所监事会绝大多数成员都与斯坦福大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胡佛研究所的所有人员均隶属于斯坦福大学，通过斯坦福大学进行聘任，大多数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是和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的，其工资由胡佛研究所和相应学院各自支付，联合任命使研究人员的工资相对较高，这也是胡佛研究所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收纳庞大珍稀史料，奠定研究基础

作为大学智库，胡佛研究所除了拥有斯坦福大学一流的社会资源外，最为独特的优势在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图书档案馆，拥有庞大的档案收藏，这些档案是在胡佛之外看不到的珍稀史料，也是胡佛研究人员得以做出独特研究的基础。胡佛图书档案馆包括美洲馆、非洲馆、东亚馆、东欧馆、中东馆、

俄罗斯馆、西欧馆七大分馆，涵盖20世纪以来的大量珍贵历史和政治史料。以东亚馆中的中国收藏为例，胡佛研究所拥有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个人日记、陈诚（“中华民国前副总统”）早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纸、海报和传单，同时也藏有一些讲述西方人在中国特殊个人经历的英文藏本，包括尼姆·韦尔斯的个人文件（他是毛泽东密友）以及保罗M·W·百克（孙中山先生的法律顾问）的资料等。这些重要而又多元的档案为胡佛研究所在美国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中承担重要的智库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胡佛研究所的人员构成及聘任管理模式

胡佛研究所的内部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监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监事会的成员主要有斯坦福大学校长、斯坦福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捐赠公司或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和胡佛研究所的著名研究人员等。监事会下设项目开发与研究、行政、财务、资源开发、外联、图书馆管理等委员会。胡佛研究所主任由监事会提名，斯坦福大学校长任命。现任主任为约翰·雷西亚，他于1986年加入胡佛研究所，从1989年担任主任至今。他的具体职责包括：负责指导和监督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和出版项目，指导研究所的图书馆和档案，并负责规划、协调及管理研究所的筹款活动和年度预算。

胡佛研究所的主体人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知名学者为主体的常驻研究人员；二是多类型的访问研究人员；三是以项目管理、技术支持、媒体联系、图书档案管理专业人士为主体的辅助人员。胡佛研究所这三类人员的比例基本上为1:1:1，按照斯坦福大学的规定，三类人员的聘任与管理模式也各不相同。

（一）注重高层次人才

的常驻研究人员聘任模式

目前，胡佛研究所有146名常驻研究人员，包括杰出学者1人、高级学者80人、高级研究员4人、研究员61人。这些常驻研究人员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主力，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域拥有很高知名度、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学者。在这些学者中，有105人是美国各类院士和各类奖章的获得者（见下表）。

胡佛研究所常驻研究员中院士和各类奖项的获奖情况一览表

院士和奖项	人数	院士和奖项	人数
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	25	美国国防部杰出服务奖章	3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院士	1	美国财政部杰出服务奖章	1
美国哲学协会会员	4	国家情报杰出服务勋章	1
美国科学院院士	6	丹-大卫奖	1
美国教育学院院士	5	亨利·基辛格和平奖	1
美国工程院院士	1	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勋章	1
美国经济协会会员	12	波兰十字骑士荣誉勋章	2
诺贝尔奖	4	麦克阿瑟奖	3
总统自由勋章	4	美国经济学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	3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1	布拉德利奖	12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	6	本杰明·富兰克林公众服务奖	2
美国国务卿杰出服务奖章	2	艾森豪威尔领导和服务奖章	1
乔治·华盛顿自由基金会荣誉勋章	3		

这些学者的学科背景多样，本文将他们所擅长的百余个研究领域归为11类，每个人都擅长这11类中的2~3个，具体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分布（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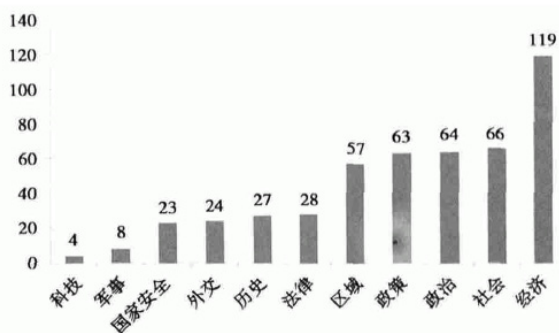


图1. 胡佛研究所常驻研究员的学术背景分布在常驻研究人员的聘任及管理上，胡佛研究所执行斯坦福大学的统一规定。根据斯坦福大学的规定，胡佛研究所可以自行任命高级学者、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不同类别研究人员的聘任规定不同。

高级学者（Senior Fellows）是斯坦福大学相关政策研究所聘用学者的一种头衔，这类学者可以是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用的正式教职人员，也可以是研究所直接聘用的校外人员，这些人员均可以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胡佛研究所根据研究需要和资金能力聘用高级学者，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和学术咨询委员会可对任命提出咨询意见。高级学者完成合同聘期后，需要经过再任命流程，完成合同的续签，即可根据双方情况商定是否继续下一个聘期。斯坦福大学还为高级学者设计了连续聘用合同，签订此类合同的高级学者不需要经过再任命流程，合同续签过程简便。但是，这种连续聘期仍不同于学校的终身教

职。

高级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Fellows）和研究员（Research Fellows）是胡佛研究所自己任命的学者，属于中心学者（Center Fellows）。他们的职位是胡佛研究所根据特殊的研究需要或学术项目设定，由研究所主任和高级学者商议后任命的。这类学者也可以是联合聘用或直接聘用，但仅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会的成员，而不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中心学者一般是固定聘期，根据聘期表现、项目需要和资金情况，研究所可以考虑续聘中心学者，但是他们不能签订连续聘用合同，每次合同期满后必须经过正式的考核手续决定是否续签合同。

（二）灵活多样的访问研究员设置模式

胡佛研究所设置了杰出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和国家研究员、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员、媒体研究员等访问项目。不同的访问学者项目也有不同的规定：杰出访问学者（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s）是访问学者中具有荣誉头衔的一类。他们不属于学校的正式教职员工，没有投票权，在受邀时来学校进行访问、讲座和研究。杰出访问学者大多数以提供讲座的形式出现，胡佛研究所 14 名杰出访问学者仅有4位参与任务小组的研究。

一般访问学者（Visiting Fellows）的期限一般为1年，最多不超过6年，需要在访问期间离开所在单位参与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任务。

国家研究员访问项目的目的是为了let优秀的学者把精力投入到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中。通常，候选人由胡佛研究所的高级学者提名，他们（候选人）需要拥有博士学位（或相当的学位），并有论文发表的记录，在经济、教育、国际关系、法律、当代历史、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有实证研究的候选人优先，每年大约有20名左右的国家研究员参与胡佛研究所的研究。

国家安全事务研究员访问项目是专门为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人员开展的项目，研究人员由军方和各政府部门推荐，进行专门的独立研究，该项目自从1969年成立以来，共有130多人参加。

媒体研究员项目允许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人员短期在胡佛研究所访问，媒体研究员可以通过研讨会和非正式会议与胡佛研究所的学者交流信息和观点，可以运用胡佛研究所提供的一切研究工具。每

年有50~100名左右的专业媒体人员到胡佛研究所做媒体研究员。

（三）专业化的辅助人员聘任模式

胡佛研究所目前共有100多位辅助人员，包括行政管理、数据支持、媒体沟通、档案图书管理等。胡佛研究所辅助人员的聘任由研究所直接负责，通过各种媒体招聘的形式进行。胡佛研究所对辅助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文以胡佛研究所数据经理的素养要求为例进行介绍。

数据经理是胡佛研究所用捐赠资金支付的一年期合同工作人员，有续约的可能。数据经理向研究经理汇报工作，负责研究活动中的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数据分析环节。数据经理80%的职责是数据管理，包括维护纵向数据库、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以保证准确的数据收集和处理、保持系统的库存数据和数据集的详细文档及数据管理程序、培训和监督实习生的数据收集和输入任务；20%的职责是研究分析，包括跟踪现有研究的热点、收集和整理能够支持研究问题的数据。应聘数据经理必须愿意通过联邦政府的审查过程，以便于使用限制性数据；必须精通MS Access、STATA、电子表格和大型数据集，拥有数据管理和组织知识，能够实施质量控制措施；拥有独立工作和领导团队的能力；拥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2~3年的工作经历；拥有硕士学位。

三、胡佛研究所的人员组织方式

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要采用工作小组和个人研究两种方式展开研究工作，胡佛研究所近年来主要鼓励研究人员以工作小组的形式进行相关研究，本文主要对这种模式进行相关分析。

工作小组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和传播目标，召集学者自愿组成，一般由1名胡佛研究所的高级学者领导。通过工作小组，胡佛研究所将研究所内常驻研究人员和外部聘用的专家结合起来，形成专门研究某一问题（或项目）的学术团队。目前，参加工作小组的有100名左右的学者，其中一半是胡佛研究所的学者，一半是所外专家。这种形式将专家组织起来可以共同研究一些确定和综合的题目，共同达到研究计划和日程安排。

胡佛研究所的工作小组多为常设性项目小组，通常以5年为一个研究周期。胡佛研究所会对每个工作小组5年周期内的成效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

继续资助，少部分工作小组会随着资助的减少或研究成果不够突出而逐渐予以取消。

胡佛研究所的第一个工作小组始于1999年的K-12教育工作小组，初步拟定的研究期限为5年。该工作小组的目标是识别和评判美国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一些能增加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对策。因为这次任务很成功，这个工作小组又增加了5年工作时间，它的组织运行方式也为胡佛研究所其他工作小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2008年至今，胡佛研究所已经设有8个工作小组，包括经济政策工作小组、能源政策工作小组、医疗政策工作小组、伊斯兰和国际秩序工作小组、K-12教育工作小组、国家安全和法律工作小组、财产权、自由和繁荣工作小组、自由社会价值工作小组。

不同小组根据研究内容与性质的不同，人员的配置也会不同，如经济政策工作小组的研究人员多为来自大学的知名学者，而国家安全与法律工作小组的研究人员则主要是来自于军方人员、律师和驻外使馆能够进行政策研究的官员等。

下面以经济政策工作小组为例，对工作小组的人员构成背景进行分析。

经济政策工作小组对当下的财务状况和政治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国内和国际的货币、财政和监管政策，其目标要求提高国家和全球繁荣的深度及广度，该小组要提供市场和政府层面的行动方案。经济政策工作小组有12名学者组成，其中5名是胡佛研究所的高级学者，1名是胡佛研究所监事会成员。学者现在或曾经在学界、政界、商界等多个领域工作或兼职（见图2）。学者的学术背景主要集中在经济、法律、政治、政策、国家安全、管理等领域（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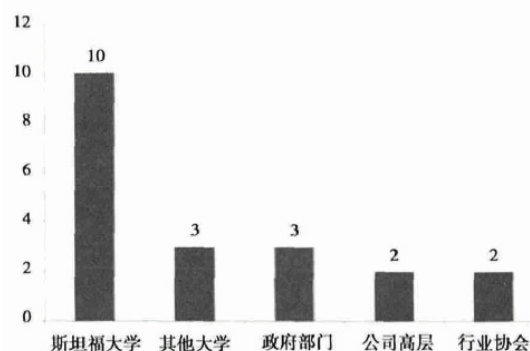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政策工作小组成员职业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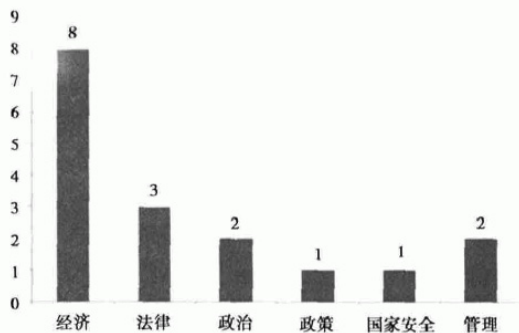


图3. 经济政策工作小组成员专业背景

四、结论与启示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作为智库取得的成功，一方面源于美国整体的政治体制背景，特别是决策体系对智库这一组织角色的重视和依赖，另一方面与斯坦福大学深厚的学科背景对胡佛研究所的支撑，以及胡佛研究所对高级研究人员和研究质量的把控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两国的政治决策体制的不同，我国大学建立智库在大环境上与胡佛研究所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胡佛研究所在与斯坦福大学之间的互动及其在人员的任用上，对我们则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强势研究领域与斯坦福大学优势学科互为倚重。胡佛研究所凭借其在国内经济政策、国际事务、环境研究领域的研究而著称，在2011年度全球智库分领域排名中，胡佛研究所这几个领域的排名都进入了前列；而这些学科恰是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学科，在美国最为权威的US NEWS大学排名2012年度分专业排名中，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排名第5，环境研究排名第1。正是背靠斯坦福大学强大的学科优势，胡佛研究所的政策研究才有了深厚的根基，而胡佛研究所的政策研究又将斯坦福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进一步地外显推广。

2. 坚守研究特色，重视长期积累。胡佛研究所的成功还得益于其对研究领域的长期积累和对研究特色的坚守。国内经济政策、国内K-12教育和以中东、俄罗斯和中国为主的国际事务研究一直是胡佛研究所常设的研究主题。其保守主义色彩一直是

被包括斯坦福大学部分师生在内所诟病的，但胡佛研究所一直坚守这一特色，从而也凭借这一特色得以重用和发展。

3. 吸纳聚集知名学者、政商界人士，形成研究所与校内其他院系之间的“内部旋转门”。在胡佛研究所常驻的100多位研究人员中，80%以上为高级研究人员，有105人次是美国各类院士和各类奖章的获得者。这些研究人员中又有80%以上由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联合聘任，由胡佛研究所和其他院系分别支付相应的聘任费用，使这些研究人员可以在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其他院系之间相互转换。

4. 改革研究组织模式，常设工作小组，吸引集聚所内外专家。胡佛研究所的研究组织模式在传统的个人研究、优先主题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工作小组的研究组织模式，对研究所长期关心的领域设立工作小组。通过工作小组，研究所聚集了相关领域内外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共同研究，所内外专家的比例接近一比一，大大增强了研究所的实际研究能力。

5. 支持大学人才培养，有效融入大学。胡佛研究所虽然没有直接的研究生培养项目，但其高级研究人员中80%以上在斯坦福大学的其他院系担任不同职称的教师，给不同院系的学生讲授课程，指导研究生。同时，胡佛研究所的每一个研究项目都设有研究实习生的职位，特别是在辅助人员系列中特设实习生项目，招纳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为项目研究提供最为基础的研究资料和数据。另外，胡佛研究所还通过开发一系列类似于公开课的讲解研究内容和成果的课件向校内和社会公开。通过这些途径，胡佛研究所成功地将研究项目的成果和大学的人才培养融在一起，从而为大学的人才培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英霞，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北京100872；刘昊，中国人民大学发展规划处，北京100872）

（原文刊载于《比较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地方高校智库的属性及其发展策略

高振强

智库(Think Tank)也称智囊机构、智囊集团或思想库、头脑企业、顾问班子等,是指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机构。在美国,智库被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或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其对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公共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智库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中国智库数量426个,是2008年(74个)数量的近6倍,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同时,我国各地高校也纷纷成立以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面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高校智库。高校智库也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咨询服务赢得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认可,逐渐成为提升我国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工具和得力机构。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得出,当前中国智库的总数约为2400个,其中高校智库约为700个。

我国高校智库近年来为政府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然而,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正如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所指出:我国大学智库的小、散、弱现象突出,力量分散,定位不准;高质量成果偏少,部分研究针对性、实践性不强、过于学术化,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大学智库潜力的发挥。因此,探讨地方高校智库的属性特征及其发展策略,将有利于地方高校智库找准发展定位,建设适应我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型智库,与其他类型智库一并成为当今我国决策咨询行业的重要力量。

一、高校智库的发展回顾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最初发展较为缓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现代智库才得到迅猛发展。有学者研究发现,

“二战”后全球每年新成立的智库数量约为30至50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每年新增的智库数量达150家左右。笔者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近6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后发现,2008年至2013年,全球的智库数量依次为:5456家,6305家,6480家,6545家,6603家和6826家,短短6年时间,全球智库数量增加了1370家。

关于智库的分类,由于各个国家的智库特点有所不同,其分类方法也不尽一致。另外,智库的分类因研究者研究视角和研究目标不同而各异。综合现有对智库进行的分类发现,多数学者或研究机构将高校智库作为单独一类进行研究。如有学者根据资金来源和机构归属,将思想库分为官方思想库、大学思想库与民间思想库三大类。有学者根据隶属关系、经费来源和研究风格等因素,把智库分为政府性质的智库、公司性质的智库、社团性质的智库和大学的智库四种类型。还有学者从我国的智库现状出发,认为可将中国的思想库分为事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企业型思想库、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思想库、大学下属型思想库四类。近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智库报告》(2013年)中,研究者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显然,将高校智库作为智库的一种类型单独进行研究在学界已是较为普遍的做法。

智库与高校密切相关。高校是知识精英汇集之地,始于1919年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库”。在1992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关于世界主要思想库排名榜上,该研究院名列第一位。1947年,美国大学中最早的地域研究中心——俄国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成立。之后,密歇根大学的日本研究中心、耶鲁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近东研究中心、宾夕法尼亚的南亚研究中心、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等大学智库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由美国的军事、情报和宣传机构等部门支持的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实用社会研究局、普林斯顿的国际社会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等也都发挥着思想库的作用。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学术型（教育型）智库逐渐发展成为政府官员提供政策专业知识的主要部门。以智库形式服务政府决策咨询活动成为高校对接社会需求的重要形式。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中心已经在美国外交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大学思想库“与官方思想库、独立思想库构成美国思想库的‘三驾马车’”。

我国“现代智库”真正出现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文革”的惨重教训让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科学决策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的智库建设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大学智库建设方面，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校要“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高教30条）强调，高校要“瞄准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国际问题，推进高校智库建设。”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精神，2013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教育部主持召开了“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强调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生力军和各学科人才聚集的高地，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力量，要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再次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因此，尽管我国大学智库起步较晚，但是，“大学智库由于具有丰富的人才支撑、可靠的资金保障和超脱的社会地位而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智库，在中国智库格局中占据了特殊地位。”

二、地方高校智库的属性特征

地方高校智库的属性特征与地方高校以及智库的特征密切相关。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指的“地方高校”主要指以应用型为定位的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的服务面向为地方，“服务面向是指高校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职能时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或行业范围。”按照潘懋元教授对地方本科院校特征的解释，“地方本科院校不同于研究型、职业型院校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它结合学科和行业分设专业，培养面向社会一线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其面向上以行业性为主导，性质上以专业性为主线，类型上以应用型为主体，层次上以本科为主流，模式上以实践性为主载，突出强调专门性、针对性、实践性和行业性。”作为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智库的特征表现为独立性、组织的稳定性、研究的“公正性”、非营利性、现实针对性和广泛的影响力等。在综合分析和研究地方高校特征和智库属性特征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地方高校智库具有如下属性特征：第一，服务性特征。社会服务是高校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外的第三大职能。地方高校以服务地方为本位，“所谓服务本位，是指将服务社会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并以此来组织教学和科研。”地方高校坚持以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的服务方向，据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征建设学科、设置专业，主动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经济。地方高校的组织运行、管理与资源配置都应以服务理念为指导，强化服务理念，凸现服务特色，努力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服务性是地方高校的基本属性。地方高校以服务需求为导向，突出服务理念对大学组织制度设计的指引与改造，突出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地位。

作为一种专门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生产公共思想和公共知识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还是高校智库，其主要功能包括提

供思想产品、搭建交流平台、培养公共人才、引导社会舆论等；它的工作范畴包括信息工作、调查研究、人才培养、沟通交流、专题培训和决策咨询等。智库也从最初的通过其研究人员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服务政府部门，发展到当代智库不仅仅满足政府的需要，而是更多地关注广大公众，并从公众利益出发来寻找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地方高校建立的社会服务体系是全方位的，包括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形成高水平的地方研究群体，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建立学校与地方政府合作互动、融为一体的机构和制度。显然，服务性乃是地方高校智库的基本属性。

第二，地方性特征。从地方高校的性质来看，地方高校一般是省市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内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创立的，具有明确的区域需求指向，承载着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从地方高校的特点来看，地方高校的办学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不仅生源来源于本地区、毕业生的就业目的地也多为办学所在地。另外，地方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研实践、产学研活动、科技成果转化等主要依托或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而进行，而且很多地方高校还是当地唯一的本科院校，肩负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繁荣地方文化，为地方政府决策和发展规划提供重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任。

地方高校的办学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自身特色，往往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状况、资源状况以及人才需求状况等因素。地方独具地域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因素对地方高校往往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地方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地域历史文化传统，整合了地域的经济、政治、地理等多元因素，传承着地域文化的遗传基因和生成密码，成为所在地高校独具的学术资源和独享的精神传统，使其饱含浓郁、深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尽管高校智库都是“为决策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理论、方法和策略等的咨询研究机构。”但是，与其它类型的高校智库，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智库相比，地方高校智库的地方性属性无疑更为突出。

第三，开放性特征。地方高校智库另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开放性。地方高校面向地方，服务地方，

通过用不同方式将社会经济功能融合到其教学科研活动之中，让学生获得面对世界日益变化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让教师通过多种途径与社会密切联系，从而了解社会和企业的真正需求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地方高校已不是传统“象牙塔”式的自我封闭的大学，地方高校具有较强的外部资源获取能力，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子系统，可以说，开放性是地方高校的基本前提。

地方高校智库从事的是实践性很强的战略咨询工作，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根据社会和市场的需要确定研究课题，同时还要使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确定研究课题，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地方高校智库要根据自身的研究领域及范围确定研究人员的学科构成，其智库的研究人员在集合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的同时，还需吸纳一些校外在实践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工作。因此，地方高校智库具有开放性特征。

第四，后发性特征。地方高校多为一些新建地方院校，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1962年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是指后发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后发地位带来的特殊益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这些优势和益处是发达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根据后发优势理论，由于地方高校智库（“后进入者”）相对于其他类型智库（“先进入者”）因较晚进入行业反而会获得其他类型智库（“先进入者”）不具有的竞争优势。

从大学科研发展趋势来看，世界发展日新月异，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为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大学科研已经逐渐由“纯科学”理论研究发展到直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解决各种社会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研究新阶段。从大学科研的导向来看，大学科研包括以增进人类知识、探索规律和真理而进行高深学术研究为首要任务的学术导向科研，以及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宗旨的社会导向科研，而科研的应用性和社会性正是我国大学科研的薄弱环节。我国各地经济社会水平不同，对地方高校的发展需求也必定不同，地方高校智库把

为地方服务的决策咨询研究作为发展的重点，重点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因此，地方高校智库具有明显的后发性特征。

三、地方高校智库发展策略

第一，差异化策略。客观地说，与地方社科院智库和一些政府研究机构相比，无论是建设基础还是研究能力，地方高校智库都处于相对劣势。地方社科院和政府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大量的对策研究，和政府部门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因此更贴近社会、贴近实践和贴近政府决策。但是，从目前地方社科院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建设现状来看，地方社科院虽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但毕竟没有多学科综合优势，基础学科研究实力相对较弱。地方社科院“作为介于政府研究机构和高校之间的研究力量，并没有体现理论和对策的双重优势，反而受其所限，既不能发挥基础理论的优势，又缺乏决策咨询服务的长处，优点不能彰显。”另外，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虽然比高校了解实际情况，但由于政府智库都是由在职和退休官员组成，研究的主题和思维模式还存在着一些部门利益和官员思维惯性，往往局限于区域视野和短暂的应急研究，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因此，面对地方社科院智库和一些政府研究机构的激烈竞争，地方高校智库只有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的自身优势，利用地方高校智库高层次人才聚集、学科综合性强、学术氛围浓厚等有利条件，结合地方高校致力于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服务性特征，扬长避短，突出个性化服务，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才能使地方高校智库真正成为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型思想库和智囊团。

第二，本土化策略。地方高校与地方有着地缘、血缘、人缘、财缘和情缘等五种缘分，地方高校在大学使命、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经费投入和教育服务区域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智库建设必须面向当地社会、面向区域市场，根据当地社会和市场的需要确定智库的研究课题，根据当地社会发展的趋势确定智库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与研究型大学聚焦重大的研究领域，服务国家重大政策，打造高端智库的建设目标不同，地方高校智库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属性特征，这就要求地方高校智库应以“立足地方，依托地方，服务

地方，引领地方”为宗旨和使命。地方高校智库应立足地方社会发展需求，在政府决策参考、社会文化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自身的咨询服务功能，为政府、企业团体等提供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咨询，使其成为地方经济发展重要的智力支持机构。

第三，多元化策略。地方高校智库具有开放性属性特征，开放性属性的基本内涵是高校智库应实行多元化开放建设发展以整合区域社会系统资源。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急剧，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社会、区域等结构性因素复杂多变，多变时代不断生发出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和新机遇。区域发展是中国整体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具有全国层面的共性，但也有区域层面的特殊性，区域发展中的问题应更多地由地方智库予以解决。

要有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新情况和 新问题，在快速变化中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和解决方案，需要地方高校智库采取多元化发展策略。地方高校智库的多元化发展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地方高校智库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光靠学校自身的预算内的经费支持恐难以为继，必须充分吸收来自政府、国际国内基金会、企业、个人等多元化的资金；二是研究人员的多元化。地方高校智库有其自身的发展目标定位，需要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工作经历的研究人员参与，地方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不仅需要本校教师参与，还应加强同校外的交流，吸纳其它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智库的研究工作。

第四，品牌化策略。随着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程序化，以及经济社会实践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类决策咨询服务机构应运而生，某类智库一家独大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如前所述，地方高校智库有其自身的后发优势，地方高校要建成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就要突出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学科建设和专家优势，结合智库特点推进科研组织创新，及时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从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形成区别于政府研究机构和地方社科院的不可复制的比较优势，形成自身品牌。客观地说，我国的智库建设方面普遍缺乏品牌意识。“品牌意识”指的是大学智库要有明确的使命和目标，

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积极打造新型智库

《中国教育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充分发挥全国领先的国际关系学科优势、开放灵活的国际交流优势，以及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优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战略研究智库。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1月24日发布的对各国6603家智库的最新评估报告，在全球150家重要智库名单中，中心排名第63位，是中国6家上榜智库之一，也是中国高校智库中唯一上榜单位。

以提供政策咨询为核心任务，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

中心以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国家战略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为目标，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和评估，公开发表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中心核心成员经常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对外政策咨询会议。中心主任王缉思教授多次组团访美，深入了解美国内政外交，为我国对美政策的制定和对美外交的开展做出了贡献。中心常务副主任袁明教授长期担任联合国基金会中国理事，为中美高层交往建言献策，在中美人文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心还先后承担中央外办、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等部门的委托研究课题20

余项，得到各部门的高度评价。

以产出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目标，建设高水平政策研究型智库

中心通过跨学科联合攻关，组织校内外以及海内外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使中心发展成为国内高校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研究平台之一，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中心完成了两项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和“未来10-15年中国国际战略环境评估及应对战略”，连续四年承担教育部《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年度蓝皮书）之国际问题研究部分的撰写工作，为国内同行提供该领域的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中心以《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年刊、“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丛书”、《国际战略研究简报》以及《战略纵横》等出版物作为智库研究成果的展示和传播平台，撰稿作者既包括中央外办、外交部、国务院侨办等政府行政人员，也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外著名学者和外交官员。中心出版物凭借其中国国家利益视角、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独立思考的风格，受到党政军相关机构官员、大学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并围绕这样的目标来构建整体的形象和影响力。地方高校智库的品牌化发展策略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要树立品牌意识。要充分意识到提高智库的品牌影响力，发挥智库的品牌效应，将有助于其保证独立性的前提下更大地影响社会舆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二是要明确研究领域。科学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方高校智库只有形成自己擅长的研究传统和研究分析领域，找准方向，步步深入，才能有所突破，最终形成特色和品牌；三是推出智库产品。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能否成功，关键还是要看能否有引人瞩目的智库产品，只有不断推出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种智库产品，满足政府和社

会的决策需要，解决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才能树立地方高校智库形象，保证智库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四是要畅通宣传渠道。地方高校多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都不算大，其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只有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提高其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树立自己的品牌。

（高振强，宁波大红鹰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原文刊载于《高教发展与评估》2014年第3期）

以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为依托，为中外决策和专家学者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

中心凭借自身的研究实力和北京大学良好的内外研究资源，将主办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与对外交流融为一体。2011年成功举办“中美关系与亚太秩序”研讨会，2012年、2013年成功举办“中美亚太安全合作对话会”、“中国、美国与东亚秩序国际研讨会”等。中心在亚太安全研究中扮演了核心与前沿角色，被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遴选为“亚洲安全倡议”全球三个核心机构之一，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普林斯顿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日本东京大学、韩国知名智库东亚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智库和学术单位长期保持着交流合作关系。

以培养中青年科研骨干为抓手，储备国际战略研究人才

目前中心的15位学术委员会委员多为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其中10位为副教授，他们通过中心组织的各项活动得到了锻炼。中心还为国内外访问学者提供理想的研究环境，为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提供了良好的培训和参与研究、教

学、翻译工作，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提高其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经验与能力。如2011年举办了“北京大学-国防大学国防论坛”，2012年与伦敦国王学院合作举办了战略研讨班，2012年、2013年两度为丹麦皇家防务学院举办“高级参谋培训班”。

以营造客观、理性的中国国际战略决策舆论环境为纽带，引导公众全面、准确地认识国家安全与国际战略问题

中心通过各种国内外主流媒体，对近年来中国外交中一些重要前沿问题发表专业性见解。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卫视中文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经济日报》、《财经》杂志、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纽约时报》、日本《朝日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的国际栏目，经常有中心研究人员的专业评论。中心研究人员力戒人云亦云，力求不媚时俗，坚持学术独立，恪守职业道德，使自己的专业知识真正服务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公众。

（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13年9月4日）